



历史中的郑州铁路工人夜校

□张 茹

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纪念堂南约五百米处，静立着一排民国时期建筑旧貌的平房，它就是郑州铁路工人夜校旧址，又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旧址。百年前，作为党的早期干部教育培训的一种形式，郑州铁路工人夜校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挥了鼓动人心的作用。

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党的先驱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而工人学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觉悟的一个重要路径。1920年底，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长辛店筹办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更是鲜明提出：“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深处中原腹地的郑州，随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全线通车，出现了大量铁路工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郑州铁路工人已经是郑州万名产业工人的主体，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并阻止马克思主义在郑州铁路工人中传播，便以“吾国路工，未受教育，故工作效率很低而损失亦大”“职工教育，实不容缓”为由，于1921年初，在湖北会馆（由在郑州经商的湖北商人出资建造）后院议事厅建立郑州铁路职工学校。学校分为补习科和普通科，设专任教员（由交通部下派，京汉铁路局委任）和义务教员（由本路职员兼任），在校工

人数约230余人，多为强迫入学。

在这种形势下，李大钊和董必武立即派遣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任教，以防止郑州铁路工人被北洋军阀政府“愚化”。赵子健先从调查研究入手，以教员身份结识了铁路工人高斌、姜海士等，通过他们了解到郑州铁路工人社会地位低下，长期遭受剥削，从洋人资本家到反动军阀、走狗，对待工人像牛马一样，任意驱使侮辱。工人的工资不仅不能养家糊口，还经常遭到克扣，尤其是法国总管到任后，“减薪裁员、任意行使”“每月扣款几次，合约工资减半”。虽然工人对此强烈不满，但由于缺乏与资本家斗争的经验，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多次抗争都以失败告终。加之他们中的一些落后分子以乡缘为纽带结成帮派组织相互争斗，严重阻碍了工人的团结与联合。认清情况后，赵子健便以教书为掩护，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向工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认清北洋军阀政府创办职工学校“学技术，升官员，加工薪”的骗局。在这个过程中，郑州铁路职工学校的性质逐渐转变，工人们的思想日益觉悟，自愿到这里接受革命教育，因为他们是利用晚上时间上课，故称“郑州铁路工人夜校”。

工人夜校的课堂上不仅有赵子健等老师，李大钊也来到这里，亲自给工人们讲授了重要的一课：“世界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铁路工人能筑路、能开车，可是终日劳动能养家糊口吗？”他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有人说工人的‘工’字是表示做工的人，永无出头之日……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工’字头上那一道代表天，下边那一道代表

地，中间那一道代表我们工人，这三道合在一起，代表工人是顶天立地的人！”然后他又写了一个“人”字：“把‘工’‘人’两字连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嘛！”“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能顶天立地。”“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李大钊用通俗的语言让工人们明白了工人阶级是伟大的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让工人门的革命意识得以觉醒。课堂之外，工人夜校还经常提供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工人周刊》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给工人们看。这些报刊不仅撕开了剥削阶级的伪善面纱，而且还详细报道了各地工人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使工人们深受启发。

不久后，郑州铁路工人看到长辛店工人创办工人俱乐部的消息，随即便派代表去“取经”。1921年8月底，在赵子健的倡导下，由高斌等48人发表了成立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的倡议书，司文德等工人夜校学员纷纷动员身边的工友们踊跃报名。同年9月，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高斌被推举为俱乐部总干事。至此，郑州铁路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和阵地，能够有力地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高斌等先进分子也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的培养下逐渐成长，走向成熟，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一开始，郑州工人俱乐部就发表宣言声援。之后，铁路当局以谈判为名，从洛阳调来火车头，以此制造复工假象，高斌带领郑州铁路工人，将火车头的锅炉拆卸下来，一举粉碎了铁路当局破坏罢工的阴谋。1922年初，因机务厂长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的自

由，待工人如牛马”，郑州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举行了驱逐反动厂首陈福海的罢工，并得到长辛店、石家庄、张家口等地铁路工会或工人俱乐部的支持和声援。经过工人门的团结斗争，最终交通部和京汉路当局答应条件，撤办了陈福海。这些胜利让郑州工人俱乐部声名远播，并被《工人周刊》誉为“郑州铁路工界的明星”。1922年4月，在郑州工人俱乐部的基础上，京汉铁路郑州工会成立。

随着郑州工人运动的发展，郑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决定2月1日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附近的普乐园（今二七纪念馆）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尽管反动军警在成立大会当天层层阻拦，大肆破坏，但京汉铁路总工会依然在工人门的顽强斗争中成立了。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开始大罢工，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至顶点。7日，反动军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高斌英勇就义，司文德等人被捕入狱。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郑州铁路工人夜校培养的大批工人学员依然在坚持奋勇斗争。

郑州铁路工人夜校是党建立初期举办的工人学校之一，它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凝聚工人力量，教育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对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走向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倡导清廉崇俭家风的晚清名臣彭玉麟

□王晓兵

彭玉麟（1817—1890年），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湖南衡阳人，清朝晚期军事家、书画家，湘军水师创建者，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清代“中兴四大名臣”。彭玉麟虽战功显赫，但一生不慕名利、清廉刚直，自言“余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他的清廉风范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彭玉麟与其母、其叔、其弟、其子、其孙、其侄等家人的书信主要收录于《清代四名人家书》中。这些家书多肺腑之言、恳切之词，告诫家人要“戒贪”“戒奢”“戒骄”，谨守朴廉。

以奉行节俭、力戒贪欲为修身准则。彭玉麟注重修身，尤其看重勤俭不贪。在其《致弟》家书中云：“崇俭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不贪亦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

彭玉麟在日常生活中奉行节俭，常穿旧衣草鞋，吃粗茶淡饭。他在《致弟》家书中称：“应领收之俸给及一切餉银，未尝侵蚀丝毫，未尝置一新袍，敝衣草履，御之而心气舒泰。中怀澄然无滓，可以明彻天地，俯仰无愧怍。”并希望家人能效法他，做到“以戒奢侈、崇俭实，戒贪欲、崇廉义为要义，不可妄制一衣、妄用一钱也”。

彭玉麟还叮嘱家人要不慕钱财、不贪权位。他认为做人须以“清、慎、勤”三字为本，其中“清”字曰“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常思谦退，不要求非分之心，不可有非分之想。“为人一世中，不过衣、食、住三者最不可少。然而衣求温暖，食求果腹，夜眠六尺地”，“何必衣必锦绣，食必膏粱，起造高大房屋，美轮美奂矣，亦享受微几”。他在《禀叔》信中说，因受恩师（曾国藩）知遇，“领水师三千人，连捷而积功”，屡受朝廷奖赏，

皆“数辞不获”，不愿接受朝廷的赏赐，“待贼弭平，当锐退求为野民。若贼既灭而不归，非特违吾初衷，近于贪位，将无以对泉下之慈亲”。“不谦退，则贪欲日炽，而常不知足”。彭玉麟常思谦退，在辞官之后，回到老家自置一茅舍，名为“退省庵”，过着俭朴的生活。

以力戒骄奢、不治私产为治家要义。彭玉麟在家书中经常劝告家人力戒浮华逸乐。他在《致弟》家书中称：“忆余受不次之擢十余年来任知府、擢巡抚，由提督补侍郎，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吾但望子孙贤能，不望金钱富饶。子孙不肖，积衣、积谷、积银、积钱、积产、积书，都无用处。”

他认为，骄奢淫逸，就会给自己留下祸根。在《致弟》信中告诫说，“养尊而处优，骄纵不自敛束，皆覆亡之道也”。正如他在《谕玉孙》信中所引用的《老子·运夷》云：“富贵而骄，自遭其咎。”彭玉麟在《谕子》信中还告诫其子“汝勿邀承余荫，便而骄纵”“不宜耽逸乐而嗜温饱，宜苦其身心，励其志气。屋后有苗圃三畦，可种菜”，以此体验苏东坡的“味菜根，而甘其冲淡养俭之趣”。在《致弟》信中则说，“其享余荫者，更宜习劳崇俭，慎勿染半饱官家子弟习气”，应当懂得奢侈浪费的害处。在《谕玉孙》信中标称：“吾家素清贫，今虽致高爵，而余未能忘情于敝袍”“每见世家子弟骄奢淫佚，恨不一一擒而置之法”。告诫子孙要注意培养俭德，不要锦衣玉食，骄奢放纵。在《致弟》信中，他叮嘱其弟，“侄女出阁，妆奁勿太过奢。盖仕宦之家，办喜事每不惜浪费，以示豪华，吾所不取”，要求其弟嫁女时要丰俭得宜，不应过分奢侈。彭玉麟还在

《谕子》的信中说，听闻家中修葺“补过斋”旧屋，用钱共二十千串，竟说“不知何以浩费若斯，深为骇叹”，对其子大加批评。可见，他对子孙的教育、对家风的约束极为严厉。彭玉麟力行朴廉治家，从未“求田问舍，私图家室之殷实”，对于买田置屋，“每大不为然”，“以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并发誓绝不为之。

彭玉麟不仅不治家产，还乐善好施，经常周济百姓。他在《致弟》信中说，“守财不施，谓之钱奴”。钱财之用途，应该拿来救济平民百姓，如此才会心安。他在《禀叔》信中云：“前寄白银四千两”“想家乡多苦百姓、苦亲戚，正好将此银子行些方便，亦一乐也”，这样“便是夜来睡眠，也觉安宁”。除了接济穷苦百姓外，还想兴办学堂，“想请五舅屈尊，把一般孩子好好教导，替吾乡造就几个人才，便是替国家增若干元气，可从四千两银子中分拨若干，作为兴学之用”。彭玉麟在遇见灾民亟需救济时，遂“将官囊所得，随缘先行布施”，这样，才“于心稍觉安泰”。他为行善举不惜散尽家财。据史料记载，彭玉麟捐于办学堂、建书院、修试馆、济穷人等各项善举中的银两数以万计。

以清正廉洁、公而忘私为做官之道。彭玉麟为官功绩卓著，虽然一生多次辞官，却在国家危难之时，抱着年近多病之躯，临危受命。光绪皇帝曾评价称，“前兵部尚书彭玉麟，忠清亮直，卓著勋勤。以诸生从戎，转战东南各省，所向有功”“十余年来，力疾从公，不辞劳怨”。他在军中的上司也称赞说：“查彭玉麟带兵十余年，治军极严，士心畏爱，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钱。今因军饷支绌，愿将应得养廉银

两悉数报捐，由各该省提充军饷，不敢仰邀议叙，实属决于荣利，公而忘私。”

清正廉洁，是彭玉麟一直恪守的原则。他在《致弟》信中说：治军须做到“勤、恕、廉、明”，“不虛糜朝廷之粮米银钱，不侵蚀弁勇之稿金恩饷，甘苦与同，取与必慎，廉则得之矣”。长江水师一万余人，所有兵饷，“余特规划盐税及长江厘金税充之”，十余年来，不劳烦户部，“派员经营，造册征收，未尝有舛误。计自乱平后，尚盈余六十余万两，余心窃忻喜”。他信奉俭以养廉，谨守朴廉。“余在军中，不茹荤，但嚼菜根，觉得甜蜜有馥果回味之妙，力自节省。”“每恩节俭以利民生，俸禄所入，除奉甘旨外，每移賑民间。”他力崇俭朴，“跨马巡行，芒屨一双，辄相随”，偶微服出访，穿着破旧的衣服和草鞋，状如村夫子。

彭玉麟为官秉持公而忘私，深为百姓所爱。他勤勉为官，“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他为官时扳倒了很多贪官污吏，当时百姓口中流传一句话：“彭公一出，江湖肃然。”彭玉麟在《禀叔》信中写道，“军旅过处，百姓率牵羊，担钱米、酒食来犒迎者，络绎于途”，离开时，百姓又“爆竹香花，跪拜道左”。老百姓对他的敬重可见一斑。



在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傅雷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傅雷一生总共翻译了30余部作品，在国内外的发行量达到千万册，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对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让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傅雷在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标识度的翻译美学特质。这种翻译美学特质以壮阔美、纯正美和厚重美为表现，以为国为民的翻译情怀、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和学养深厚的翻译底蕴为支撑。

为国为民的翻译情怀成就其译作的壮阔美。将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的翻译追求紧紧结合在一起，由此而成就了傅雷翻译的气象壮阔之美。

20世纪30年代初期，傅雷有感于国家的混乱与民众的萎靡，遂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巨人三传》讲述了三位名人的故事：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托尔斯泰。他们都是经历了各种磨难却没有向命运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不屈不挠进行抗争的杰出人物。在稍晚的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傅雷又耗费心力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以“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而在40年代初期，傅雷重新翻译了《巨人三传》中的《贝多芬传》，并在《译者序》中写道：“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无论是翻译罗曼·罗兰以贝多芬为原型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重新翻译《贝多芬传》，傅雷都是希望通过贝多芬的不朽抗争精神来唤醒与鼓舞国人的斗志，以与黑暗的时势相抗争。

翻译题材的选择体现的是译者的情怀与良心。在革命战争时代背景下，傅雷没有去做一个旁观者，也没有去进行一些“吟风弄月”式的创作，而是以自己的译笔作剑，为摸索前行中的人们增强信心和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国为民的情怀，傅雷的翻译作品才能够展现出特有的壮阔气象。傅雷“作为一个热诚的爱国者，有意识地把自已的译事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试图用作品来鼓舞广大青年勇敢面对苦难并奋起抗争”。这种壮阔之美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虽历久而弥新。

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成就其译作的纯正美。在进行翻译创作时，傅雷一以贯之的态度是精益求精。无论翻译什么作品，傅雷都专注于字斟句酌。

对于一本自己反复品读、了然于胸的《贝姨》，已经具备相当翻译经验的傅雷还是花费了8个多月的时间对该书进行逐字逐句推敲。傅雷在写给好友林以亮书信中谈到了这件事，林以亮感慨：“以傅雷的经验修养，每日平均也只不过译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字，可见翻译是快不来的。”翻译家、傅雷研究专家金圣华也曾谈到，傅雷“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如《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

在这种精益求精的打磨之下，读者才能得见那些文辞优美、表意得当、读之忘俗的傅译名著。傅雷在翻译《都尔的本堂神甫》时，已经有了30年的翻译经验，但仍三易其稿，某些段落甚至改动六次；而傅译名著《老实人》更是前前后后经过八次改动。作家、评论家柯灵在《怀傅雷》一文中对傅雷的翻译过程有过真切的描述：“傅雷译书的惯例，首先是再三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

傅雷翻译的美学特质

□王翊民

方，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开始落笔。初稿译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誊清付排。亲自看校样，边校边改，直至清样，还有改动。”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使得傅雷的翻译作品具有经过千锤百炼后的纯正之美。

学养深厚的翻译底蕴成就其译作的厚重美。从法国文学翻译来看，译者众多且风格不一。傅雷的翻译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翻译成果中脱颖而出，给世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很大程度在于傅雷具有学养深厚的翻译底蕴。

傅雷的学养积淀于文学、美术、音乐等诸多方面。在文学方面，傅雷具有较强的文学品鉴能力和较为丰富的文学评论经验。他对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赵树理的《三里湾》、康濯的《春种秋收》等都有过切中肯綮的评论。在美术方面，傅雷在回国之初，受聘于上海美专，教授过美术史和法语，并著有《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对美术作品有着独特的感悟。在音乐方面，傅雷在家书中与儿子傅聪畅谈音乐时，表现出极高的音乐鉴赏能力，而且对经典名著中的音韵表达有着独到见解，专门谈过白居易诗歌的音韵美。这些在《傅雷谈艺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多方面的学养为傅雷的翻译提供了无尽滋养，也成就了傅式翻译的“腹有诗书译自华”。

如，“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是傅雷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头句子的翻译。这一充满着诗性美的开头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经典名句。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将整部书的气势与神韵都表现出来，令无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读者记忆犹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傅雷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调动了自己各方面的学养，在尊重原文基础上巧妙运用中文特有的表达方式将句子翻译得形神兼妙，令中国读者享受到文学翻译独特的文字之美、画面之美与音韵之美。而这样的美，说到底是在深厚学养底蕴基础上的厚重之美。

